

CHINA & US Focus

中美聚焦

文摘

2017年9月号 总第2期

“后美国时代”来临



CHINA US Focus

出版 中美交流基金会

主 席 董建华

发 行人 黄锦辉

主 编 张 平 常 虹

顾 问 朱英璜

编 辑 彭 慧

《中美聚焦文摘》是一份双月刊杂志，刊登中美两国具影响力的领袖和学者有关两国相关议题的评论文章。

您的意见和建议，请电邮至
digest@cusef.org.hk

公司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3 号亿利商业大厦 20 楼
电 话 (852) 2523 2083
传 真 (852) 2523 6116



www.chinausfocus.com

特别鸣谢 BLJ Worldwide 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鼎力支持



6

“后美国时代”来临

“后美国时代”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什么？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国际力量对比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他领先国家将随着美国的退步而崭露头角，但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依然可期。

4

主编寄语 / 张平

6

封面文章

“后美国时代”来临 / 何亚非

10

2017 美国 - 中国智库报告

22

中美关系

实用主义可能主导下一个 50 年
/ 崔立如

24

中美关系：对抗与合作 / 贾庆国



39 解决朝鲜问题需建立联合阵线

不断升级的朝鲜危机意味着各方，包括中国和美国，必须加紧遏制平壤，并在这一问题上建立联合阵线。



53 人工智能 —— 新的合作前沿

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人工智能领域两个最强的参与者，必须携手合作管理这项新的技术。

- 28 稻草人与修昔底德陷阱 / 杰瑞德·麦金尼
- 30 **经济贸易**
中美经济关系向何处去？ / 刘遵义
- 34 中美断层线 / 黄育川
- 36 中美没必要就知识产权开战 / 何伟文
- 39 **北朝鲜**
解决朝鲜问题需建立联合阵线 / 陈东晓

- 44 朝鲜或许再次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 迈克尔·格林
- 47 寻求共同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 / 金淳基
- 51 **南中国海**
重要的“一小步” / 朱锋
- 53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 新的合作前沿 / 李峥 牛帅



主编寄语 | 张平

不确定性、“体检”与特朗普中国行

特朗普入主白宫已近 8 个月，美中关系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在特朗普于 11 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我们可以期待在今秋看到更为清晰的前景。

打着维护航行自由的旗号，美国持续挑战中国对南海的领土主权主张。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商业行为发起 301 调查的决定引发了贸易战恐慌。朝鲜近期的导弹试射和核实验又唤起可能把两个大国卷入其中的战争担忧。

然而，北京和华盛顿都承认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也都深知冲突的巨大代价。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会晤，以及二人的多次电话通

话，为双方提供了增进理解的机会。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很可能强化这种关系，并孕育出具体成果。双方有充足空间来管控分歧，并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期，我们刊登了中美两国顶尖学者和研究人士的各自看法，他们为双边关系进行了一次“体检”，并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建议。

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复杂性，以及南海争端的敏感性是本期重点关注的两个主要话题。面对中国崛起和力量平衡的深刻变化，本期其他一些评论文章选取了更为长远的观察视角，对未来 50 年中美关系的演变作出展望。由前中国外交部副部

长何亚非执笔的封面文章探讨了“后美国时代”的前景，及其给全球治理带来的变化。

这些都是难解的问题，但现在思考这些问题正逢其时。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China This Week

CHINA^{US} Focus



Keep You up to Date on China



Subscribe: ctw@chinausfocus.com



“后美国时代”来临

“后美国时代”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什么？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国际力量对比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他领先国家将随着美国的退步而崭露头角，但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依然可期。



何亚非
前外交部副部长

很多学者都在讨论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其实答案简单明了。我们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它意味着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世纪成为了过去。我们目睹的不仅是新时代的来临，而且这一划时代进程正在加快，其结果是世界秩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历史角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人类正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个新时期始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称霸世界的终结，如果必须

确定象征这一新时期起点的分水岭，也许就是2008年，当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与政治后果。而2017年也是全球向“后美国时代”转型进程加速的起点。随着全世界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现实，未来全球关系又会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经济不平等导致民粹主义兴起

21世纪前10年，美国被迫调整其战略目标，“全球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这个10年里爆发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美国的软硬实力皆蒙受巨大损失。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浮出水面。由于始终把中国当成主要目标，美国的立场从被动军事威慑转向主动参与，目标从南海东海到中印、中国-东盟和中日关系。

全球化经历了前有未有的转型，“再全球化”将成为“后美国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支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双方力量的交锋比以往更加激烈。

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此次摇身变为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强力支持者，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巴黎协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优先”本身并不是问题，而一旦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追求“美国优先”，就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问题。这种“角色大逆转”始于“后美国时代”发端之际，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因为它决定了美国在世界秩序转变过渡期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角色逆转不仅限于北美，从2016年年中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将欧洲一体化计划置于险境开始，民粹主义候选人也在欧洲现身了。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本轮全球化为世界带来70多年的经济繁荣，它的核心理念是资本自由化，也就是资本应投在经济增长最需要的地方。遗憾的是，资本总是流向利润更大的领域，而且根本无视这一过程制造的社会不平等。

引燃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的一个关



键因素是贫富差距扩大。为更好地分配全球化利益，必须保持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这个责任必须由政府和其他重要社会行为者来承担，单靠市场是徒劳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把市场、资本和私有化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给以此为经济指导思想的许多国家带来大面积伤害。

“后美国时代” 有哪些特点

“后美国时代”最明显的特点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逐年增强，全球力量平衡被重置。所谓“大趋同”——IMF基于购买力平价（PPP）创造的词汇——已经成为现实。IMF预计从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将从64%下降到39%，同期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GDP占比将从12%上升到39%，其中中国占21%。在美国继续为其经济发展方向展开辩论的同时，新兴国家在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3月16日公布政府首个预算蓝图《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预算蓝图》，寻求大幅缩减联邦部门和机构，以便为上调国防开支提供资金。

全球力量中心已经从大西洋两岸向远东转移。



■ “数篇研究报告分析了美国队长这个标志性角色和他支持的美式民族主义。他有关美国身份认同的叙事方式非其他偶像能做到，并常常被粉丝和创作者看作美国人可效仿的一个理想版。”

——《美国队长以及超级英雄的内心挣扎》，作者：克里斯蒂安·斯蒂恩梅茨

“美国优先”本身并不是问题，而一旦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追求“美国优先”，就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成长，因此“大趋同”将成为这个新时期的特有现象。

此外，为全球经济增长与政治进步提供指导方针和样板的理论框架出现根本性转变。随着经济新自由主义及其作为经济改革药方的“华盛顿共识”破产，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说的缺位在过去10年里一直困扰着各国。人类渴望新思维、新范式、新思路和新的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全球目光日益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国。

中国的确有许多理由成为“后美国时代”来临时的全球焦点。不可否认，中国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穷国变成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全球关注不仅在于中国创造了经

济奇迹，还在于中国采取并至今坚持着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模式。

鉴于这方面的成功，中国一直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对全球自由贸易的一贯支持，以及它在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参与——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在“后美国时代”作为负责任大国更有担当的几个范例。

习近平主席深刻洞察全球治理的未来，他对国内与全球治理的思考全面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全球化的实际情况，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受到欢迎，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根植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则相形见绌。这种全球思潮的转变是“后美国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就连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在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和特朗普总统就职演讲后也表示，“比较两位国家元首的演讲，你会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亨利·基辛格博士更加概括性地指出当今国际体系正在经历4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上一次根本性变革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它结束了欧洲的“30年战争”。已故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呼应基辛格的想法并评论道：“全球力量中心已经从大西洋两岸向远东转移。”

随着世界秩序改变，“后美国时代”有望迎来更美好的未来，同时也由于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而面临不确定性和潜在的不稳定性。

美国在未来日子里无疑仍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治下的和平”的

终结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失去全球领先地位，只不过世界不再是单极的了。美国对“后美国时代”来临的反应与之前的霸权国家并无不同，它罔顾现实，继续挥舞“美国第一”和“美国例外”大旗，拒绝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崩塌。美国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焦虑促使它加倍努力抗衡这些新兴力量。

中国如何走向 “再全球化”

中国将继续给予全球化和再全球化坚定不移的支持。全球化让中国受益良多，通过市场与政府发挥各自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作用，中国成为为数不多成功保持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良好平衡的国家之一。

说明中国致力于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最好例子就是过去五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治理原则、理论、政策和思路。其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都旨在构建一个更强大的国际社会。而“共享”是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核心，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后美国时代”必将面临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挑战。这一挑战主要有两方面：地缘政治纠纷和大国冲突风险，国际安全基础设施整体机能失调。

地缘政治纠纷增加和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需要所有相关国家以政治

智慧和不懈的和平努力去寻求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尤其应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本着这一精神，中美通过国家元首间的频繁对话和各个层面的磋商达成了基本谅解。

此外，以美国及其盟国为基础的全球安全体系缓慢解体和机能失调正在惹来麻烦。美国及其盟国数十年前设计并维护的这一体系漏洞百出，且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格格不入。另一方面，虽然联合国安理会是唯一获得全球授权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但这一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却时常被迫偏离轨道或被忽视。

中国提出的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理念，其性质是开放平等，目的是通过全方位合作培育更有效的集体安全。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与97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安全合作新愿景有着巨大潜力，受到众多国家的欢迎。

归根到底，“后美国时代”已经来临，并且会持续下去。今天我们的世界面临三重挑战：地缘政治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持续不断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些挑战也许尚未极端化，但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它们也许就会演变成巨大灾难。世界秩序虽说在朝着更加公正平等的方向转变，但全球治理体系必须有相应的调整。现在是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认真对待这些全球性挑战，并审慎有力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经济新自由主义把市场、资本和私有化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给以此为经济指导思想的许多国家带来大面积伤害。

美国及其盟国数十年前设计并维护的这一体系漏洞百出，且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格格不入。

2017 中美智库中美关系联合研究项目

2017 中美智库中美关系联合研究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NIGS，CASS）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牵头，中美两国近 20 家机构 40 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该项目从 2016 年 6 月开始，为时一年，是中美智库首次进行同步研究，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把脉，为决策提供参考，也为社会提供资讯。

2017 年 5 月，中方在北京发布报告《超越分歧，走向双赢》；7 月，美方在华盛顿发布报告《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视角》。双方报告从经济、亚太、军事、全球治理和政治五个领域分析了中美关系现状。两国报告长达上百页，专家观点精彩纷呈。《中美聚焦文摘》在特别策划中为读者呈现双方的共识与重大的分歧、以及双方对管控分歧扩大共识的出谋划策。

报告全文，扫码下载



《超越分歧，走向双赢》（中方报告）



《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视角》（美方报告）

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关系处于重大转型



中美关系正处在冷战后新一轮重大转型之中，既有老麻烦也有新挑战。应高度重视中美彼此战略误判、两国关系战略漂移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代价。

中国崛起是对美国的战略挑战，这是美国不能忽视的。“重返亚太”构想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重大转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让美国再次伟大



两种“伟大”的碰撞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实现了初步崛起，开始努力从全球视角审视和推进外交政策、更加主动参与全球事务、重新确认自己新定位。

“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优先”这一主旋律下，特朗普当选总统，其引发的关于美国在全球舞台角色的大辩论将会延续长达数月，甚至数年。



不确定与不信任



两国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难以做出明确判断，由此带来巨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感，双向怀疑和不信任感有所加深。中美关系进入一种竞争与合作同时增强的“新常态”。

美国不能遏制或孤立中国，中国不能将美国赶出亚洲，但中美并非注定要相互对抗。



如何避免成为战略性对手



- 就国际秩序愿景持续沟通；
- 理解彼此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避免战略误判；
- 避免被第三方因素干扰绑架，提出“中美 +X”的新型多边合作框架；
- 大力培养合作习惯、探索新方式解决新难题；
- 找到界定双边关系的准则、建立通畅、坦诚、高效的对话机制。

- 建设性地处理紧张局势；
- 需要一个新的过程来设置两国共同利益的基准线；
- 需要强有力的双边机制来处理意料之外的危机和问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研究员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约翰·哈姆雷 (John J. Hamre)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GLOSSARY

“中美 + X” 新型合作框架

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日益受到“第三方因素”牵扯，包括朝、韩、日、越、菲、俄等。“第三方因素”是把双刃剑，既有可能缓和也可能激化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应对“第三方因素”进行更好管理，避免被其干扰甚至绑架，发挥其正面效应。中美可通过合作共赢精神和开放包容姿态建构“中美 +X”的新型三边 / 多边合作框架。



界定相互关系的准则

上世纪末中美共同提出“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 年美方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得到中方正面回应；2009 年中方提议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美方高级官员提出“战略再保证”想法；2013 年中方提倡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中美双方应找到界定相互关系的便于表述的准则。

共建真正双赢的经贸关系



对既往双边贸易获益存在共识



中美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过去 40 年间，美中经贸关系广泛、深入发展，为两国、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对未来竞争与合作孰大孰小存在分歧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合作多于竞争。中国经济转型将会促进双边贸易平衡、为贸易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从而增加两国紧密度。

两国经济表现出的互补性越来越少，竞争性越来越强。中美关系具有广泛有益性的看法正在消失，美国对美中经贸关系的忧虑达到 40 年内最高点。



不同诉求



建设性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尽快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

更平等的经贸关系、增加中国市场准入并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强化保护知识产权、改变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等。



市场准入

贸易摩擦



知识产权



不同展望



谨慎乐观。中美两国未来经济的变化既会促进两国的合作，也会促进两国的竞争。两国经济在共同演进，总体仍然向好，但在具体领域双方利益冲突会有所加剧。

更为悲观。美国不可能保持历史上采取的普遍合作和开放态度。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最有可能转向更受限制或有条件的合作，紧张关系是否能缓解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关切。



何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甘思德 (Scott Kennedy)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



苏庆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易明 (Elizabeth Economy)
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熊爱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GLOSSARY

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贸易额从 1979 年的 25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5196 亿美元，38 年间增长了 211 倍；中美服务贸易额目前也已超过 1000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底，中美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1700 亿美元。2015 年美中双边贸易和投资为美国创造约 260 万个就业岗位，为美经济增长贡献 2160 亿美元。得益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 1-1.5 个百分点。

更受限制或有条件的合作

美方专家预计，未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最有可能转向更受限制或有条件的合作。所谓受限制的合作，指美国将维持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的广泛开放态度，但将更积极地利用和扩大现有双边贸易投资审查工具，并更积极地在世贸组织提起针对中国的诉讼。所谓有条件的合作，指美国将重点在美国和中国企业在对方国家面临的市场准入水平上实现更大的平等或对称。

亚太安全



“亚太” VS “泛亚太”？



“亚太”主要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视美国为“外部干涉势力”。

持“泛亚太观念”，美国是亚洲的常驻大国。与印度、越南或澳大利亚相比，关岛和阿拉斯加距离北京、东京和首尔更近。

对彼此的亚太战略意图存疑

美方试图防止一个崛起的中国侵蚀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将中国崛起视为其全球最大战略威胁之一。

随着中国实力增长，中国正采取措施削弱美国在本地区领导力。中国希望将美国逐出本地区，或者削弱美国在本地区最重要的利益，建立自己的排他性势力范围。

谁导致东海、南海紧张升级？

正是美国“重返亚太”导致亚太海洋争端问题愈演愈烈。中国的海洋维权行动是对日本、菲律宾挑衅的反制。

中方使用恫吓手段损害了和平崛起的期望，可能损害美国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并可能威胁航行自由。“重返亚太”恰是因为中国举动令盟友希望美国在本地区发挥影响力。

包容性安全或同盟式安全？

美国在亚太的安全秩序、利益不能容纳也不能顾及非同盟国家，是当前亚太安全矛盾和摩擦的制度性根源。中美要想在亚太共存，唯有超越现存安全架构，共同促成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安全秩序。

自己在本地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盟友的安全和繁荣。亚洲盟友的经济成功和安全是美国外交政策在 21 世纪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解决亚太问题的出路， 避免零和竞争



应理解彼此的战略利益

关键在于理性界定彼此的利益与空间。

理解彼此的战略利益是扭转亚太背景下双边关系下滑的出发点。

有效沟通和对话

有效沟通和对话是缓解分歧的基础。

中美双方都可以从实质性的战略对话中受益。

避免零和游戏和冲突

坚持用合作和非对抗性方式来面对和处理中美之间的一切争议和冲突，是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关键。

避免追求权力和影响力的零和竞争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双方也依赖彼此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PAN ASIA-PACIFIC ASIA-PACIFIC PIVOT TO ASIA



朱 锋
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胡 波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迈克尔·格林 (Michael J. Gree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
高级副总裁



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扎克·库珀 (Zack Cooper)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

GLOSSARY

重返亚太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欧关系主导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已将亚洲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挑战，自视为亚洲常驻大国的美国日趋介入本地区事务，而这在中国看来是导致本地区紧张局势的重要原因。

中美“大交易”

中美“大交易”是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和原则上作出让步，以换取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不过美方专家认为，这一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美国有一些人也许支持这种想法，但“大交易”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一个安全、稳定和开放的亚太秩序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6 月和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基本特点有三：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美方认为这一提法让美方感到不适：一是美国政府对任何排除其它大国的中美共治不感兴趣；二是美国领导人不会支持任何排除其最亲密盟国的大国组合；三是美国担心中方这一提法以及强调“核心利益”，是意在建立自己的排他性势力范围。

军事与国防



对军事关系的现状和趋势判断

更为悲观。双方军事关系近年来保持了持续性和稳定性。但双方军事利益的碰撞面迅速扩大，显示出更多零和性质和地缘战略竞争趋向。

相对乐观。两国军事关系是几十年来最稳定的；防卫部门之间的交流达 1980 年以来最高水平；高层接触、对话和操作层面的积极互动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军事关系变得更加具有韧性。但美方也认为竞争在加剧。

非敌非友

中国没有将美国定位为敌人，中美之间利益重叠大于利益冲突。

美国不以中国为敌，但出于政治原因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国。



双方皆有两手准备

中国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但一旦战争强加到中国头上，则坚决打赢战争。

美国防务部门对华交往有两大层面——战略和操作层面的接触，以及长期操作和战术层面的对冲，以确保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美国能保持作战优势。

“遏制中国” VS “把美国赶出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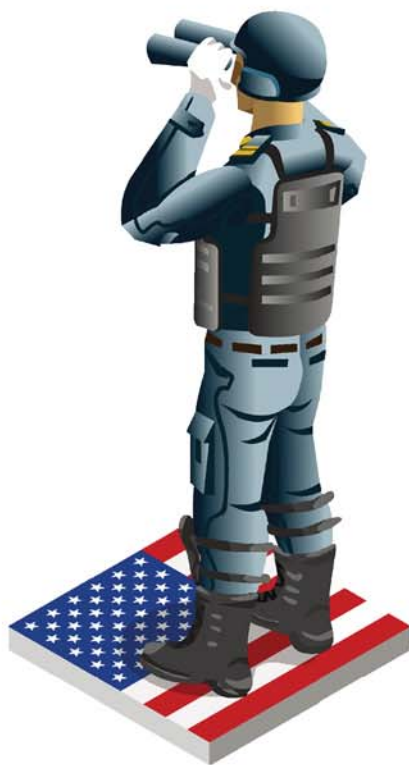
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旨在遏制中国，使中国产生强烈的被排除感。

同盟关系本质上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应对针对美国或其伙伴的侵略，而非针对某个国家。中方反对这一体系意味着不接受美国在本地区拥有合理的国家安全利益。

危机管控

管控分歧与危机是发展军事关系的重点，双方应避免“安全困境”，不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

双方应把管控好竞争面视为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一大关键目标，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姚云竹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前主任
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冯德威 (David M. Finkelstein)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



赵小卓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孙飞 (Phillip C. Saunders)
华盛顿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薛瑞福 (Randall G. Schriver)
阿米特齐国际咨询公司创始合伙人



张沅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吕晶华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博士后

GLOSSARY

再平衡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将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具体措施包括：在本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平台和系统；发展和引入新的作战概念；传统同盟关系的深化和现代化；现有同盟关系和新防卫关系的网络化；扩大军力部署的地理分布；加强伙伴能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军事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指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可能引发战争。过去 500 年间全球共有 16 起崛起大国威胁取代守成大国的先例，其中 12 起以战争告终。中美双方领导人都已意识到这一风险，并共同表达了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决心。

政治因素影响双边关系



对政治因素影响双边关系的视角不同

中方认为是议题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分歧是中美关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冷战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再被置于双边关系首位，但围绕人权、民主化和宗教自由等议题的政治分歧依然时刻影响双边关系。

美方认为是部门主导：上世纪 80、90 年代，国会主导美中关系，尤其在台湾、人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国会推动对华施压；到了新世纪，行政部门尤其是白宫主导美中关系，商界和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力和不同利益诉求共同影响着双边关系。



“颜色革命”在中国？

美方意图是介入中国内政以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美国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逻辑和假设，似乎是期待中国在此进程中出现“政治民主化”、思想舆论自由化和经济资本主义市场化。而当美国看到中国与其期待相反时，抵触、怀疑、防范心理与日俱增，认为中国崛起会对美国构成各种挑战。

虽然有些观点推崇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但信奉者并不多。美国长久以来的共识是，中国与世界互动越多，中国在认知、利益和偏好上就越发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一致。美国对把中国拉入这一互动网络持乐观态度。

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分歧

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

更发达的民间社会、更充分的宗教自由及更有活力的问责制会使中国更加成功。

内政还是外交？

中国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奉行“己所欲，施于人”。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国内政事务，也希望美国尊重中国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中国坚决不能接受美国对外输出所谓的民主政治模式。

美国在整个外交中始终重视价值观的作用。

对双边政治关系的趋势预判

谨慎乐观。中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双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分享共同利益，开展广泛合作，这有助于排除政治干扰，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相对悲观。美国利益攸关方对中国发展趋势出现逆转日益感到担忧。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能为政治进步乃至双方互信铺平道路存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疑问和争论。



倪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麦艾文 (Evan S. Medeiros)
欧亚集团亚洲部董事总经理



刁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迈克尔·格林 (Mike Gree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高级副总裁



樊吉社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研究员



迈向更好的全球治理

中国重要性在上升



中国愿意承担更多责任，但能力有限；可能与中国应“承担更多责任”的期待有落差，造成“选择性参与全球治理”的印象。



中国日益愿意且日益能够参与全球治理；领导力应与责任相匹配，如果中国想要在主要国际努力中获得一席之地但又避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北京就不应期望其他国家会让中国在设置议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重写规则？

双方均认为：

不应屈从于“膝跳式”反应：北京不应自动假设美国牵头的倡议仅服务于美国的单极利益；华盛顿也不应自动假设中国牵头的倡议会削弱自由国际秩序。

不应削弱现有全球治理机构：如 UN、WTO、G20 等多边合作组织。



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

气候变化

共识大于分歧：无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是否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国都有机会展示新型领导作用。



网络空间



强调“安全与发展”平衡；希望在现有机制基础上更多关注机制建设的“公平”与“公正”。



重视“经济利益考量”；强调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核扩散



中美在防扩散、核安保、核电安全领域交集多、分歧少，双边合作可能成为推进全球治理和润滑中美关系的亮点。



美中在达成伊核协议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无数其它防扩散问题上，两国也面临重要合作机会。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研究员



易明 (Elizabeth Economy)
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
长



傅晓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安全研究所所
长



韩美妮 (Melanie Hart)
美国进步中心中国能源与气候政策高级分
析员



李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研究所副
所长



刘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安全研究所所
长助理



葛维宝 (Paul Gewirtz)
耶鲁大学法学院宪法讲席教授

文佳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
座研究员



付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
究所副研究员



严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安全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



孙成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GLOSSARY

全球化 2.0

“全球化 2.0”是强调以多元身份共存为特点的全球化，有别于此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1.0”。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 2.0”加速发展，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全球经济新趋势。这一个概念旨在打造一种更加开放、平等、平衡和包容的全球经济。

主编



傅莹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迈克尔·格林 (Michael J. Gree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高级副总裁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克斯 (Christopher K. Johnso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超越分歧，走向双赢》（中方报告）
《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视角》（美方报告）

实用主义可能主导下一个50年



即使中美关系要经历不可避免的危机，我们仍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中美关系发展要有长远眼光是中国领导人经常强调的观点，现在美国总统也这样讲，并前瞻50年。这表明双方之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讨论未来50年中美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下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时期。变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对于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将不得不进行重新评估。

目前战略竞争态势正在形成，似乎在取代过去两国关系中的以合作为主导。

目前流行的看法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中美两国将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因互不信任导致

冲突。如果双方处理不好，这一切就可能成为现实。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如果双方都认为存在风险，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解决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一方或双方作出必要的改变，但目前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

然而，在没有找到根本解决办法之前，我们至少可以来管控问题，使之不要失控。为此，两国政府努力对战略竞争进行管理，包括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对于两国关系安然度过不可避免的危机来讲，这是当前最切实可行的措施。近年来，中美两军加强各级别交往对话，推动军事互信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近日中美双方又就两军联合参谋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部对话机制框架达成一致意见。

两国关系的竞争性上升难免对相互间战略意图揣摩产生不利影响。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变得突出起来。中美两国在协调与合作应对地区争议问题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当前，中美合作应对朝核问题带来的共同挑战，所需要的互信和战略智慧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在东海的中日海洋争端和南海领土纠纷问题上，美国以对其盟国的所谓安全义务为名介入干预，不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复杂问题，而且迫使中国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的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这将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需要在中美和相关国家之间共同探讨。

在两国经贸关系方面，双方之间的竞争也变得突出起来。特朗普一再宣称，要把解决对华经贸关系的所谓“不平等”问题作为他贯彻“美国第一”原则的重要目标，并为此多次发出要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威胁。最近，特朗普政府决定启动 301 条款对华调查。作为回应，中方表示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自己的权益。由此激

发了人们对中美贸易战的担忧。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基础足够扎实，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动力足够强大，长期以来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不会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将继续为中美新关系提供支撑。

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日益密切的双边联系，共同改变着中美关系。中国“和平崛起”是推进这一变化的主动力量，美国的“再平衡”是对此作出的反应。双方的互动特点是竞争与合作，这将是未来 10 年或 20 年过渡期的常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关系演变进程。

在未来 50 年时间里，理想的情况是中美关系从管控竞争和避免对抗为主，逐步转变到更加稳定而积极的“共同进步”过程。为此，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不但要面对眼前的问题，更要着眼长远的目标，不但需要对历史有深刻的反思，更需要对未来双边关系有共同的建构。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在这两方面的共同努力。

过往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告诉我们，务实主义和理性的利弊权衡总是能主导双方的决策，这也是我们可以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的原因。◎

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变得突出起来。

目前战略竞争态势正在形成，似乎在取代过去两国关系中的以合作为主导。

中国“和平崛起”是推进这一变化的主动力量，美国的“再平衡”是对此作出的反应。

中美关系：对抗与合作

中美关系最终有可能介于敌对与友好合作之间，并继续在有限冲突与有限合作之间摇摆。

中国的崛起，西方的相对衰落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都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近7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关系演变成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并塑造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如今，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使西方主导地位被削弱，而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让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受到质疑。所有这一切对中美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两国会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走向战争吗？还是如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发展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虽然有人预言说，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中美两国终会兵戎相见，但它发生的机会仍然很小。首先，我们生活在核武器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一场最终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战争。而且，中国从未寻求过领土扩张。事实上，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寻求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并通过谈判成功划定了大部分陆地边界和部分海上边界。而中国将来也不可能寻求领土扩张。尽管中国对海上主权主张及部分遗留的陆上争端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但它的领土主张一向未变。

而且，自上世纪70年代重返国际体系尤其是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逐渐融入现有国际秩

序，并与美国一样成为一个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中国并无兴趣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事实上维护这一秩序对中国有利。这就需要中国照顾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愿望，以获得它们的合作。最后，虽然各国的优选项不同，但中美双方原则上共同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如和平、稳定、法治、人权和民主。随着中国日益走向现代化，两国在实践这些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会缩小。

如果两国关系不是以对抗告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将发展出一种以非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呢？虽然不是绝无可能，但也颇为困难。首先，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它与美国的关系。经过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两国的实力差距已经大为缩小。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经济学家预计，要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名义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全面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已经造成双方的焦虑。此外，两国发现很难彼此平等相待。中国日益担心美国计划围堵或遏制中国，美国则日益担心中国计划扩张领土或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况且，中国的崛起导致它的身份和利益发生变化。中国已经不再是过



贾庆国
北京大学教授

随着中国崛起，其经济发展方式与美国日益矛盾。

去那个贫穷、落后、虚弱的发展中国家，但它也还不是一个富裕、先进、强大的发达国家。两者都似是而非。身份决定利益，所以中国很难界定自身的利益。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发现很难确定自己的利益所在是优先强调发展权，还是推动减少碳排放，因为它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国家利益决定对外政策，由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有双重国家利益，所以它发现自己无法实行一致的对外政策，这使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复杂化。

此外，随着中国崛起，其经济发展方式与美国日益矛盾。多年来，虽然引入诸多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却仍以国家为中心。中国政府不仅为经济发展制定、实施5年规划，还通过政策扶持和补贴有选择地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

以往，这对中美关系来说并不成为一个问题，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且缺乏竞争力，部分是因为现有经济理论认为国家干预市场是不会成功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与效率的增长，美国人开始愈加严肃地看待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方式。他们担心中国的做法会扭曲市场，牺牲美国的利益。为此他们要求中国政府放弃这种做法。最近去美国，我听到许多美国人抱怨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个为期10年的国家规划旨在全面升级中国的产业，它由工信部起草，由国务院通过并于2015年公布。中国政府会放弃中

国人普遍认为符合本国利益的经济发展计划吗？当然不可能！未来日子里经济发展方式的冲突很可能困扰两国关系。

最后，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相应改变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二战以来，美国将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定义为领导、塑造以及维护世界秩序。美国人认为，美国只能通过维护世界秩序来增进它的利益。也因此，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

美国人很早就意识到维护世界秩序代价不菲。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就指出，从历史上看，超级大国衰落不是因为它们被新兴大国打败，而是它们被维持秩序的成本压垮。想象一下，保护国际海上航道、执行WTO规则与环境条约、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都需要花掉多少钱吧。

为避免霸权衰落的命运，或尽可能推迟它的到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减少维持世界秩序的成本。概括说来，二战结束后，美国为应对这一挑战做了三件事：（1）建立了一个军事联盟体系；（2）创建了一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构；（3）与其他国家发展各式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回报它们的帮助，美国对其他国家作出各种承诺。总之，这让美国得以利用这些国家，并以最小成本维持国际秩序。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或许使这

为避免霸权衰落的命运，或尽可能推迟它的到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减少维持世界秩序的成本。

一切发生改变。他力主美国通过牺牲盟友和伙伴利益来减少国际承诺，希望美国成为一个搭车者，而不是国际秩序的守护者和领导者。为此，他主张的政策是：（1）“美国优先”；（2）盟国向美国交更多保护费；（3）对等贸易；（4）双边协定。

如果特朗普得逞，短期内他也许能凭借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与别国达成更好的协议，但长期看，他的做法将破坏让美国受益匪浅的现有国际秩序，阻碍对增进美国利益来说十分重要的国际合作。

美国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对中美关系有广泛影响。一个被弱化的世界秩序可能会：（1）使中美如何处理彼此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不确定；（2）使两国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及其他类型的冲突；（3）使两国就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进行合作更加困难；（4）促使美国的盟友自主掌握本国安全，包括寻求核武器，因为这是最廉价的防御手段。简言之，它会让已经十分复杂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一些人也许会说，唐纳德·特朗普任期有限，他离职后继任者会推翻他所做的一切。也许是，但他的一些政策也有可能保留，因为他的当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是对以往历届政府政策的回应。

有鉴于此，中美关系最终有可能介于敌对与友好合作之间，并继续在

有限冲突与有限合作之间摇摆。一方面，利害关系重大，双方共同利益颇多，亟需合作。另一方面，分歧切实存在，双方不信任感极强，有所行动的冲动难以抗拒。剧情将怎样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管控双边关系的眼界、智慧和技巧。◎

另一方面，分歧切实存在，双方不信任感极强，有所行动的冲动难以抗拒。剧情将怎样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管控双边关系的眼界、智慧和技巧。



China-US Focus Digest is now in Chinese



Click: chinausfocus.com/digest-magazine/

稻草人与修昔底德陷阱

格雷厄姆·阿利森对中美冲突过程的描述，即他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外交政策圈引起了激烈辩论。本文作者杰瑞德·麦金尼探究了林蔚在最近一篇批评性文章中的观念差异，尤其是那些林蔚用来说明姑息迁就比审慎的对抗更加危险的历史性证据。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在专门发表与中国有关新闻的网站SupChina上撰文，对格雷厄姆·阿利森的新著《走向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作了尖刻评价。他提出三个主要论点：阿利森曲解了修昔底德；历史“教训”告诉人们绥靖是种错误；阿利森忽视了中国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困难。总之，他发现阿利森的书“肤浅”。但这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观点。

格雷厄姆·阿利森对修昔底德的理解有问题吗？有。就我所知，对于修昔底德到底写了些什么，以及如何把它与今天相联系，我2015年10月的《把修昔底德放回修昔底德陷阱》仍是最详尽的一文。可能阿利森确实低估了当代中国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但这难道就意味着阿利森写的全是废话？非也。

林蔚对阿利森的评论缺少中肯，他自认为他所设置的论据可以一举将对方驳倒。但让人尴尬的是，林蔚甚至不能令人信服地击倒他自己的稻草人（指虚设的靶子）。

为击倒他的第一个稻草人，林蔚

提出三个反例。第一，在修昔底德的历史时期，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阿希达穆斯让雅典人撤销墨伽拉法令，如果雅典简简单单答应这一要求，战争本来可以避免。第二，1904年，是新兴大国日本发动了与既有大国俄罗斯战争。第三，1941年，不是美国与日本开战，而是日本与美国开战，30年代的德国亦是如此。

林蔚的第一个反驳理由完全正确。只要雅典取消墨伽拉法令（显然是对墨伽拉实行商品和人员禁运），伯罗奔尼撒战争几乎肯定不会发生。这一禁令由雅典的伯里克利实行，作为对斯巴达盟友墨伽拉的惩罚（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67节）。但这个论据已有太多证明，详细情况下面会提到。

林蔚的第二个反驳理由依然完全正确。1904年是日本发动对俄战争，而不是相反。但问题不在这里。林蔚过于在字面上解读阿利森的论点，断言“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据必须是既有大国发动对新兴大国的战争。而事实上，阿利森只是使用“修昔底



杰瑞德·麦金尼
盘古智库客座研究员

格雷厄姆·阿利森对修昔底德的理解有问题吗？有。

而事实上，阿利森只是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来指通常的力量转移现象，其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



德陷阱”这种说法，来指通常的力量转移现象，其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是政治学家们长期以来提及的事情。

林蔚的第三个反驳理由听上去不错，但不足以证明他的观点。确实，日本在珍珠港对美国发动进攻，但日本的进攻是否是在回应美国旨在“消除日本威胁”的行动呢？事实上这仍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观点也不一致。例如，有严肃的历史学家认为，是美国有意挑起与日本的战争，以阻止它进攻苏联或东南亚。美国甚至想以此作为介入对德战争的手段。另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是无意当中惹来这场进攻。说到挑衅问题，美国1941年7月26日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对日本实行燃料禁运。这种冻结威胁日本的生存，因为日本85%左右的石油是从美国以及荷属、英属东印度群岛进口。由于欧洲战事正酣，德国又入侵苏联，日本此时无处进口石油。日本人意识到自己陷入字面意义上的贫瘠，而出路只有

两条，要么投降，要么开战。他们选择了战争。可说的还有很多，但关键点非常简单：历史不是道德传说，美国在1941年确实下重手挑衅了日本。与第一个例子中的雅典人一样，美国决定宁愿接受战争，也不愿撤销冒犯对方的法令。两个例子中经济禁运都成为战争导火索，这绝不是巧合。

那么，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呢？林蔚告诉我们，这些“教训”教育人们，“对侵略者的姑息，危险远远大于采取审慎的对抗。”这是他的第二个稻草人。任何有心了解阿利森论证的人都应该知道，阿利森并没有主张任由中国征服亚洲。事实上，他讨论的是双方的切身利益以及通过“冒险一战”保护这些利益的必要性。林蔚用“绥靖”一词说明奥巴马政府上一个10年后期在南海明显“擅离职守”，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更令人诧异的是，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林蔚完全没有尝试去评估南海争端的加剧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意外的、不可预测的区域性事件影响，比如2010年日本逮捕中国渔船的船长，或2012年日本将尖阁群岛/钓鱼岛国有化。其实在这一时期，许多严肃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只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挑衅作出回应。

林蔚历史“教训”的最后讽刺在于，他拿出的历史事例不仅不支持他“对侵略者的姑息，危险远远大于采

取审慎的对抗”的结论，而且正好相反。雅典人为什么不撤销墨伽拉法令？因为它的领导人不愿向斯巴达让步或与之和解，换作林蔚讥讽的说法就是“姑息”敌人。不“姑息”的结果就是30年战争，它摧毁了雅典的黄金时代。“那希特勒呢？”林蔚会回应。好吧，他又是什么情况呢？上世纪30年代后期那种认为绥靖能满足希特勒野心的想法是愚蠢而错误的，但这不代表绥靖政策要为二战负责，因为希特勒是一心要发动战争。同样这不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就是当代希特勒，而林蔚的论点却是基于这种假设，尽管他没有明说——当然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那不是事实。真的有人以为，中国领导人的想法与希特勒提出的“生存空间”一样吗？后者集各种狂热于一身，包括确保粮食安全，让德国成为与美苏比肩的欧陆帝国，实行仇视犹太人、斯拉夫人和罗姆人的种族主义，通过“东方总计划”号召灭亡波兰民族、饿死乌克兰人、灭绝犹太人，将德国的疆土向遥远的东方扩展。如果有人真是这么以为的话，请证明你的立场，如果不是，就不要再提什么希特勒了。

美中之间存在现实的战争危险。如果两国想避免战争，双方必须各退一步，并改变当下的行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才是阿利森的观点，真正的书评是会认真对待这些观点的。◎

其实在这一时期，许多严肃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只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挑衅作出回应。

中美经济关系向何处去？

中美加强经济合作是正和博弈，可以实现双赢。两国经济复苏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加大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理智，更重要的是自身利益，终将占据上风，从而避免一场重大贸易战的出现。



首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7 月 19 日在华盛顿结束，对话未达成协议，没有联合公报，甚至各自计划中的记者招待会也先被美方、然后被中方取消。这对未来中美经济关系意味着什么？

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非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在这个时候都不可能作出重大让步。在中方，中共关键的十九大将在下季度召开，展示信心与力量对中国十分重要。在美方，特朗普总统兑现竞选承诺，如废除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沿美墨边境筑墙、重谈北美贸易协定，都不会顺利。朝鲜问题依然棘手，还有正被调查的“通俄”事件。其他提议，如减税、重建基础设施等，也几无进展。总统需要清清楚楚的、

公众看得见的胜利，而不是某个问题的妥协。他是交易商，是生意人，并不是联盟或团体的建设者。而在战术上，虚张声势符合他一贯的谈判作风，如果交易有利，他是会回头的。

双方所声称的原则都是无懈可击的。美方强调平衡、公正和互惠，中方强调谈判应该非对抗、相互尊重和互利双赢。然而，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双方并不习惯友好平等地对待对方。中国在许多世纪里一直是亚洲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直到 1840 年以前，所有邻国在它眼里都是附庸国。这之后，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从未被其他国家平等相待。美国在二战中拯救了英国和法国，占领了德国和日本，也从不把它的盟友看成是平等的。这样一来，美中两国之间的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谈判更加困难，因为与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合作在此处并不一定奏效。

美方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些要求，甚至连美国企业都不支持。例如，通用汽车和福特就不希望降低中国的汽车关税。这两家公司在中国有庞大的汽车生产业务，现行关税对它们是有利的。美国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铁和铝实行进口配额，或加征关税，但从中国进口的铁和铝只占美国总进口的极小百分比，对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方面实施任何措施，都只能是象征性的。另外有一定可能性的，是美国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样它就能针对中国采取更多贸易保护措施。但是，过去一年来，如果中方对汇率有任何操纵，那也是防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与它为获取出口优势应该做的事，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何况，人们也可以说，美国因为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也是间接的汇率操纵国。

其实，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最近一份着眼于国内增加值（即各自国家向对方出口商品和服务所创造的GDP）的研究报告估计，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327亿美元。而如果只按美国的商品出口数据估计，对华贸易逆差则达到3674亿美元。而且，这种基于增加值的估计，还没有包括中国企业向美国公司（如苹果、高通）在海外（如爱尔兰）的子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这些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理应被归为美国对中国出口服务的收入。如果把这部分算进来，美中贸易逆差甚至更小。再者，必须承认，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减少，并不等于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总的贸易逆差减少，而后者对帮助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减少，只是因为中国产品被来自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顶替，那么美国工人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事实上，靠减少双边贸易（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来缩小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并不符合美国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让我们考虑一种极端情况：假设双边贸易同时中止，那么贸易就会“平衡”，逆差为零。这意味着两国对彼此的出口都下降，双方损失大量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升高，消费者将承担高得多的物价。这对于两国是双输。因此，对话努力应着眼于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以此缩小双边贸易逆差，让两国双赢。譬如，目前美国对石油天然气的出口限制已经放宽，中国可以根据国内现有需求从美国大量进口；如果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国也可以增加进口；除了已经大规模进口玉米和大豆，中国还可以增加其他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如牛肉、猪肉、大米和奶制品；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会持续增加，尤其是中国公民现在可以获得10年内多次入境签证；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也会

其实，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在这个时候都不可能作出重大让步。



迅速增加；中国对外国全资商业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的限制有可能放宽——只要它们满足条件对等和资本门槛要求，并在中国国内有资本本土化的子公司。经过双方协同努力，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即使不完全消失，也有望在几年之内大幅缩小。

另一个影响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要素，是中国过剩的储蓄。中国每年的国民储蓄占GDP的40%以上，鉴于目前主要制造业几乎都面临产能过剩，这些储蓄无法在国内得到有效利用。所以，过剩的储蓄必须用作海外投资，而美国是投资天然目的地之一。这也是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必要性、紧迫性所在。中国的储蓄可以投资于美国基础设施项目，或者直接投资，或者购买其债券，这样也可以助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实现他的一个竞选承诺。有些人或许担心，

美国基础设施被外国人拥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但事实上，基础设施在美国，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可以随时介入。

总而言之，中美加强经济合作是正和博弈，可以实现双赢，这一点基本无疑。两国经济复苏应该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加大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已经稳定在年均6%至7%的水平，是美国的两到三倍，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对美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可能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这样一来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缩小。无论如何，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对双方都是有害的。我相信，理智，更重要的是自身利益，终将占据上风，从而避免一场重大贸易战的出现。◎

■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2017年7月19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上就经贸问题交换看法。

然而，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双方并不习惯友好平等地对待对方。

因此，对话努力应着眼于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以此缩小双边贸易逆差，让两国双赢。

其实，美中贸易逆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美方数据：



2016 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高达 3470 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 47%。

U.S. statistics

中国一国的贸易顺差，跟其他近 200 个国家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差不多。



U.S. statistics

美中贸易逆差的关键事实数据

事实一

最重要的是，中方虽有巨额账面顺差，但其实钱并没有装进中国人的口袋。因为中国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主要是做装配加工品，产品附加值低。

以富士康生产的 iPod 为例

中间品进口到中国 = 200 美元
iPod 成品出口到美国 = 209 美元
中国只挣到 = 9 美元
但是，
在算中方出口时却是 **209 美元！**



事实二

在美方的统计中，从中国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也计算在内，这并不合理，因为中国香港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港，从香港出口的商品并不都是从内地转口过来的。

2016 年中美服务贸易

2016 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是 1181 亿美元，其中美方顺差达到了 556.9 亿美元约占中国整个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 **23.3%**。

事实三

美国只强调他们的商品贸易逆差，但从来不提服务贸易顺差。比如，中国企业每年向美国公司（如苹果、高通）支付高达数百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理应被归为美国对中国出口服务的收入。

中美断层线

短期内，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也许与外交政策有关，如对朝鲜的立场转硬，或发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为美国采取更具惩罚性的经济措施。

中国主张经济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分开，为此北京热情欢迎4月份的海湖庄园协议，其重点是开放而非关闭市场，并淡化了安全问题。然而，朝鲜问题缺乏进展和中国继续在海上独断专行，使特朗普总统重新倾向于使用美国的经济影响力获取北京政治上的让步。而中国也并非全然无辜，因为它经常采取惩罚性经济行动，来表达对邻国外交政策的不满。

我的《破解中国难题：传统经济智慧为什么错了》一书，对这些紧张关系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这种紧张其实源自对中美贸易投资关系本质的根本误解。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交锋是由经济力量驱使，因为中国的崛起让华盛顿不由思索其全球统治地位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弱。而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又无端扭曲了人们的感受。可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主要取决于国内，而不是它的贸易伙伴，就业的增长或流失也很少是贸易上的问题。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政府赤字过度 and / 或家庭超前消费的结果。那些看上去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其实有偶然性，之所以产生困惑，是因为中国扮演的是最终组装地角色，而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零部件是通过它运到

美国。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集中在较发达的东亚经济体，但中国21世纪初成为地区生产线中心后，逆差就转向了中国大陆。因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规模实际上是基于美国与其盟友的逆差，特别是日本、台湾和韩国，许多昂贵部件都是由它们生产。

在这个节骨眼上，解决投资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也许更有用。但这方面的讨论，也被误入歧途的民粹主义情绪所劫持。一般认为，美国有太多海外投资投向中国，进而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和竞争力下降。可尽管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过去10年美国只有1-2%的投资投到中国，而中国只有2-3%的对外投资投向美国。为什么中美之间的投资往来并不是太多，反而是太少呢？

数额如此之低，部分原因是数据欠缺，因为全球大量对外投资是通过模糊了来源地的避税天堂进行的。不过，用国家作比较，有助于纠正这种扭曲。看看欧盟，它的经济规模可与美国媲美，而过去10年它与中国每年的投资往来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虽然10年前起步时美欧的水平相当。

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与美国相比，欧盟的制造业优势与中国的市



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可尽管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过去10年美国只有1-2%的投资投到中国。

就中国企业而言，欧盟市场更容易渗透，因为它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且没那么多的安全担忧。

场需求更具互补性。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以机械、交通运输装备和高档消费品为主，这些产品需要通过引进外来直接投资，为其市场开拓和售后服务提供支持。

相比之下，过去 10 年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三大类产品一是油料谷物，二是令人匪夷所思不会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废旧回收物（废旧金属、废纸）。第三类主要是波音的航空航天产品，但波音直到前不久都隐而不发，未在中国市场上公开运营，而其欧洲竞争对手空客公司从 2008 年起已经在中国设立了制造中心。

进口的制成品和与之相关的投资在中国国内市场相当受欢迎，也更契合欧盟的竞争优势。而中国服务业的封闭对美国更具负面影响，因为美国的优势是高端服务，尤其是在 IT 和金融领域。

至于中国向海外投资，欧盟也更具吸引力，因为中欧各自的产业结构比中美更具互补性。而且，从政治上说欧盟也比美国更欢迎中国的投资。

就中国企业而言，欧盟市场更容易渗透，因为它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且没那么多的安全担忧。这可以看成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如果有欧盟国家限制市场进入，中国企业仍可通过其他成员国打进更广阔的欧盟市场。而在美国，虽然有可能与个别州合作，但相比欧盟更开放的环境，美国联邦政策优先的做法对中国投资者是不利的。

推动双向投资对双方都有益，但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反对任何鼓励美国企业增加海外投资的协议。尽管如此，推进已经谈判多年的双边投资协定，仍应当被列入优先议程，哪怕它

不符合政治考量。

如果处理不当，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巩固各自权力的时候，就有可能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因为他们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上的抱负是相似但又矛盾的。

两人都希望提升自己国家的形象，习近平是通过实现他的“中国梦”，特朗普是通过实现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二者都在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美国，民粹主义观点就是全球化毁掉了大量工业岗位，保护主义才是核心解决方案。在这种氛围下，多边方案会让位给混淆经济与政治目标的扭曲的双边选项。由于 WTO 制裁等传统经济手段被证明对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无效，于是，白宫的一些人便把美国与日本、韩国战略结盟和挥舞“台湾牌”，当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相比之下，北京在充分利用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议程方面比美国更为积极主动。其表现是支持贸易自由化，设立亚投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此加强与欧亚地区的联通。但北京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是有限的，因为它限制资本的流动，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有限的，因为它限制信息和思想的流动。

短期内，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也许与外交政策有关，如对朝鲜的立场转硬，或发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为美国采取更具惩罚性的经济措施，如给中国的出口产品设限。这些事件会否导致更严重的冲突，抑或双方能理智地就保持亚洲地区稳定繁荣达成路径共识，仍有待观察。◎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政府赤字过度 and / 或家庭超前消费的结果。

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二者都在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中美没必要就知识产权开战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决定采取单方行动解决与中国的知识产权纠纷，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美国应该通过现有 WTO 框架解决问题。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8 月 14 日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性转让美国技术和剽窃美国知识产权”。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随后根据 1974 年美国贸易法第 301 条款宣布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调查。

特朗普总统称这是“一大步”。确实是一大步，后退的一大步。

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两国政府建立了包括针对知识产权问题在内的官方对话及工作层面的合作渠道。两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

作多年来收获颇丰。美国和中国都是 WTO《知识产权协定》（TRIPS）及其他相关国际公约的签字国，特朗普政府本可以简单地将所有知识产权问题提交 WTO 解决。那么，单方面启动 301 调查所为何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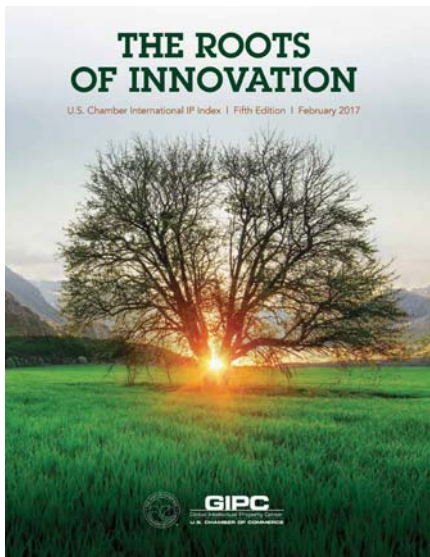
301 条款对中国不具司法权

301 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美国企业是否在海外市场遭受不公平待遇，并在情况属实条件下采取行动。但它只是美国法律，不是中国法



何伟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 过去 5 年，美国商会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年度报告为衡量全球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为决策者和思想领袖通过强化知识产权提高竞争力提供了一份路线图。

律或国际法。基于 301 条款的调查结果对中国企业采取任何行动，在中国都不具有司法权。另一方面，WTO 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协定》，它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涉及中美贸易的任何知识产权问题也都应由它管辖。WTO 成员之间的任何知识产权纠纷都可以提交给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

除了对美国没有好处，美国贸易代表的 301 调查还将严重损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调查前，美国贸易代表将寻求与中方进行磋商，但这不会是一场友好的对话，而是提出要挟，它将导致中国的不满。如果美国采取商业报复，中国一定会以牙还牙。

无论如何，哪一方都不会得到好处。 不存在强迫性技术转移

有一种误解是，外国高科技公司在投资中国时被迫要把技术转让给中方合作伙伴。李克强总理和工信部部长苗圩对此已经予以否认。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虽然中国在加入 WTO 之前曾强迫外国高科技公司转让技术，但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这种做法已经被取消了。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且不需要为此转让他们的技术。

如果被迫转让情况属实，美国公司可以向中国政府提供证据，事情无疑会得到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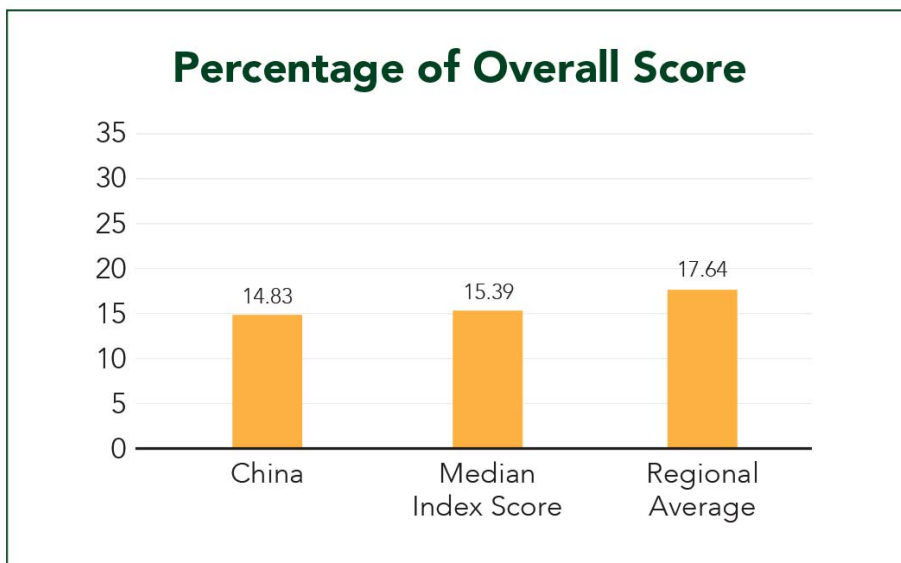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在进步

据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的

特朗普政府本可以简单地将所有知识产权问题提交 WTO 解决。

■ 商会 2017 年的《创新根基》指数成为全球 45 个经济体知识产权水平的基准，这些经济体约占全球 GDP 的 90%。中国的整体知识产权指数为 42%（得分 14.83，满分 35），排在第 27 位。报告称“中国的总分数在逐年升高”。

Rank: 27/45



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且不需要为此转让他们的技术。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8 月 18 日宣布根据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展开正式调查。

“301 调查”将调查中国在知识产权、创新和技术问题方面的法律、政策与行为。

但它只是美国法律，不是中国法律或国际法。

年度报告，中国的知识产权指数是 42（满分 100），在受调查的 45 个经济体中排在第 27 位。中国的得分落后于美国、英国、欧盟和日本，但远远领先许多发展中国家。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来，中国引入了知识产权保护新机制，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这有助于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和盗版活动。

美国中国商会 2015 年的白皮书发现，只有 22% 的会员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令人满意，但是有 82% 的人称赞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在 2017 年的白皮书中，其会员对中国的五大关切是：对法规的解释不一、成本上涨、保护主义增加、缺少合格的管理、难以获得所需的许可证。而知识产权问题过去 6 年里从

未进入过前五位。

这些结果表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远远不够，但每年都有很大的进步。

通过 WTO 框架进行对话与合作

美国贸易代表不应继续推进 301 调查。相反，美中两国应该启动知识产权对话，使之成为基于 WTO 规则的双边对话机制的一部分。两国应携手达成友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让商业上的紧张升级。⊙

据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的年度报告，中国的知识产权指数是 42（满分 100），在受调查的 45 个经济体中排在第 27 位。



解决朝鲜问题需建立联合阵线

不断升级的朝鲜危机意味着各方，包括中国和美国，必须加紧遏制平壤，并在这一问题上建立联合阵线。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在东亚特别是朝鲜半岛坚持三个目标。

一是在朝鲜与美韩外交关系正常化前提下，促进全面的和平与稳定。

二是通过劝阻平壤不再实施核武器及核导弹计划，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中国来说这是防止整个东亚地区走向核化的关键。

三是中国旨在通过保持自身防御优势和可靠的战略威慑水平，维护其与美国之间的地区战略平衡。

但朝鲜半岛目前的安全局势似乎正在偏离北京的目标，其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朝鲜加强其核武器和导弹能力所带来的风险。

一方面，它使朝鲜半岛核扩散逆转的前景荡然无存。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导弹能力的规模和速度都在增加，金正恩六年前继承权力以来平壤进行过三次核试验，据称第四次试验指日可待。平壤还进行了75次以上中

短程弹道导弹试射，其中包括从潜艇发射导弹。

仅在2017年7月，平壤就进行了两次远程导弹试射。不少人确信，它试射的导弹为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足以打到美国本土。这是一个重要而令人吃惊的进展。尽管对导弹的瞄准系统及有效载荷有各种估计，但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似乎已确定无疑。目前真正的问题是，在日本和韩国发展自身核威慑力量之前，它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信心还能保持多久？

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战略存在。为加大对朝鲜的军事压力，美国在朝鲜半岛实施空中行动，并与盟国韩国和日本一道举行军事演习。

尽管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提出对朝鲜的“四不”保证——美国不寻求朝鲜政权更迭、不寻求搞垮朝鲜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朝核问题紧张局势的螺旋式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华盛顿和首尔对朝鲜政策的反复无常，这使它们的信誉受损。

朝鲜“火星-12”发射轨迹



■ 朝鲜 2017 年 8 月 29 日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火星-12”穿越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上空。这是朝鲜第 5 次发射飞越日本列岛的弹道导弹，这枚导弹飞行距离为 2700 公里，最大高度 550 公里。之前几天，金正恩当局曾向日本海发射 3 枚导弹。

政权、不寻求加快南北统一、不寻求为跨过“三八线”找借口，但是，包括相当数量国会议员在内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与朝鲜进行谈判已经是过去式。特朗普总统一直呼吁贯彻他的“最大限度施压”政策，包括力压中国对朝鲜实行制裁和经济禁运。

每当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敌意和紧张上升，它们的误判风险和发生意外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不可低估特朗普总统的刚愎自用和性情无常。他最近“愤怒与火力”的挑衅言论对阻止平壤无济于事，反而加剧了紧张。

其结果是，地区安全与战略稳定面临崩盘危险。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不仅削弱了中俄两国的战略威慑力，也导致中韩关系紧张。

也许更重要的是，朝核问题让中美关系更难预测。华盛顿抱怨说，北京对朝鲜有独一无二的经济影响力，

但未能尽职尽责阻止平壤的错误行为。而北京则认为美国降低朝鲜半岛风险的尝试皆不成功。

当然，平壤必须被谴责，因为它违反联合国决议，对地区紧张局势全面上升和地区动荡负有责任。但人们普遍认为，朝核问题既是朝鲜半岛安全局面的因，也是果。朝鲜决定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原因，是华盛顿和首尔对平壤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

今天，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唯一仍存冷战架构的地方，“三八线”仍是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军事对峙之地。从平壤角度看，发展核武器为它提供了一个威慑要素，可以通过提高冲突的代价，来抵御美国旨在更迭其政权的攻击和其他的外部威胁。

平壤永远不会怯于利用核武器计划，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来争取更多的好处。但它也应该认识到，坚持发展核武器

北京向华盛顿发出的信息也必须十分明确而坚定：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采取任何旨在更迭朝鲜政权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中国将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干预。

将使它的改善经济（即“并行政策”）变得遥不可及。

朝核问题紧张局势的螺旋式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华盛顿和首尔对朝鲜政策的反复无常，这使它们的信誉受损。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的战略合作与协同努力缺位，使平壤有了更多的机会去钻空子。

这些空子让朝鲜得以躲避国际压力，降低了胡萝卜和大棒的效果和可信度。更重要的是，主要参与方——尤其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深深的战略互疑，使本该用来对付朝鲜核计划的联合阵线变得愈加脆弱。

十多年来，北京一直努力尝试影响朝鲜半岛的安全进程，它召开“六方会谈”，鼓励华盛顿与平壤的和解努力，敦促各方最大限度克制，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但北京的政策仍有改进的空间和必要，特别是如何发出更强烈、更清晰的信息，表明自己反对平壤的核武器计划以及其他有违联合国决议的相关计划。北京今年决定通过减少与平壤的经贸联系给朝鲜施压，这是让平壤为其不負責行为付出更多代价的正确一步。

话虽如此，但平壤和华盛顿才是最终解决朝核危机的关键。北京绝不会接受美国及其他国家对没有出力解决危机的指责。

北京很可能更加大力奉行“双轨”政策，同时寻求中止朝鲜的核武进程，鼓励朝美之间展开建设性对话。

一方面，北京决心向平壤发出更强烈信息，即它的核武器开发将面

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更强硬、更坚决的反对。北京必须重新考虑给予平壤的准联盟承诺，除非后者停止核武器计划，停止其他所有损害中国重大安全利益的单方挑衅行为。朝鲜只有按照联合国决议冻结并最终结束它的核与相关导弹计划，才能从国际社会获得经济、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回报。虽然北京将不遗余力地穷尽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但它也在加紧为最坏的情况作准备。

另一方面，鼓励美朝、韩朝实现和解同样至关重要。这方面的挑战，是如何更加步调一致地整合施压与对话，使与平壤的对话尽可能清晰、有力和具有可信度。作为缓解紧张的第一步，平壤和华盛顿都必须认真考虑“双暂停”方案，即平壤暂停核与远程导弹试验，作为交换，华盛顿及盟国暂停针对平壤的联合军演或其他炫耀武力的把戏。同时，北京向华盛顿发出的信息也必须十分明确而坚定：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采取任何旨在更迭朝鲜政权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中国将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干预。

为给扭转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恶化和化解朝核危机注入新动力，包括中、俄、美在内的重要参与方亟需加强合作，协同努力。应当鼓励创新思路，如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向平壤提出联合安全保证，以换取冻结并最终结束核武器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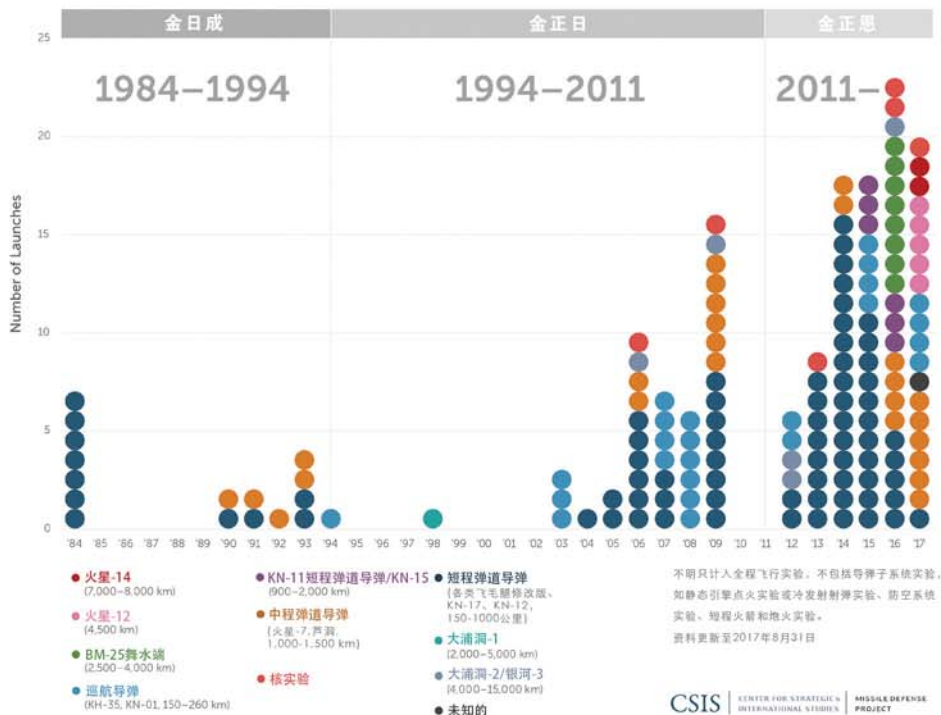
单方面施压和零散的刺激都是无济无事的。鉴于朝鲜半岛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所有当事方都应该趁着为时未晚加大降低风险努力的力度。◎

北京必须重新考虑给予平壤的准联盟承诺，除非后者停止核武器计划，停止其他所有损害中国重大安全利益的单方挑衅行为。

但朝鲜半岛目前的安全局势似乎正在偏离北京的目标。



朝鲜导弹发射



2017年朝鲜的导弹发射

- 2月12日 ● KN-5/北极星-2
- 3月6日 ● 火星-7/增程飞毛腿导弹 (共发射4枚导弹)
- 3月22日 ● 不明*
- 4月4日 ● KN-7
- 4月16日 ● KN-7
- 4月29日 ● 不明
- 5月14日 ● 火星-12
- 5月21日 ● KN-15/北极星-2
- 5月29日 ● KN-17**
- 6月8日 ● 4枚地对舰巡航导弹
- 7月4日 ● KN-14
- 7月28日 ● KN-14
- 8月26日 ● 2枚飞毛腿导弹
- 8月29日 ● 火星-12

导弹类型

KN-15 / 大浦洞-2
中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

Hwasong-7 / 增程飞毛腿***
短程或中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

KN-17***
短程或中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

火星-12
中程弹道导弹，液体燃料

KN-14 / 火星-14
洲际弹道导弹，液体燃料



资料来源CNN*专家对发射导弹的类型有争议**朝鲜宣称发射了新式导弹，但专家表示怀疑

***专家对导弹的归类有争议

大事记：朝鲜导弹事件 VS 联合国制裁

下表以时间轴的形式，记录了近年来朝鲜相关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及其引起的联合国制裁内容。



(更新至2017年8月31日)

朝鲜或许再次决定美中关系的未来

如果金氏政权垮台，美中两国会有合作的共同基础。但如果没有更多技术上的、现成的交流，朝鲜巨变带来的冲击就可能致互不信任和敌意，让美中在整个地区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的根本分歧暴露殆尽。

金日成 1950 年 6 月对韩国的入侵，比冷战前半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让美中两国彼此敌对。由于他的孙子金正恩正加速研发能够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再次成为有可能决定 21 世纪美中关系未来进程的变量。为结束朝鲜核威胁进行真正的战略合作，将改变北京与华盛顿的双边关系，而对平壤局势升级处理不当和互不信任，

则将固化分歧，让我们回到从前的敌对状态。

目前有关美中朝核危机合作的争论主要是战术性的，即华盛顿能否接受北京的建议，用外交手段与平壤打交道，以冻结朝鲜的试验换取冻结美韩军事演习。但要想认真讨论美中的战略协调，就必须首先认识到，“以冻结换冻结”的想法是行不通的。美日韩进行任何自我约束，姑息摆在



迈克尔·格林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高级副总裁



■ 由于朝鲜核与导弹计划不断升级，8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严厉惩罚朝鲜的新制裁决议，包括超过10亿美元的煤及其他产品出口禁令。这将重创朝鲜的出口，去年它的出口总额为30亿美元。决议禁运对象包括4个行业：煤、铁和铁矿石、铅和铅矿石、水海产品。



■ 中国山东省东部日照的一个码头卸载进口铁矿石。遵照联合国对朝鲜核与导弹计划的制裁决议，8月14日中国宣布禁止从朝鲜进口煤、铁矿石和其他产品。

眼前的朝鲜威胁，换取它暂时停止试射，都只会削弱美方同盟的威慑力和信誉。毕竟，如果美国本土受到的威胁增大，即使日韩所受的威胁并未绝对减少，美国也会削减其保卫盟友的战备力量。我们还知道，对之前所有冻结核武器的外交协定，平壤都有百分之百的作弊纪录。这并不是说应该完全停止与朝鲜的外交，只是我们不能再指望朝鲜愿意通过外交谈判中止其核武器与导弹计划，哪怕我们靠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政权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么，美中之间真正的战略合作是什么样子的？某种程度上说答案就在安理会。对加强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安理会 2371 号决议，北京再次投了赞成票。这一次还堵住了朝鲜向中国出口煤炭的漏洞。然而，联合国制裁的效果（而不是象征意义）取决于执行。过去 15 年中国的执行情况有所改善，但大多无关痛痒，而且与朝鲜违反之前的制裁、日益好战和进行武器试验的节奏完全脱节。美中之

间真正的战略合作在于中国更积极地全面执行联合国现有制裁决议，阻断朝鲜的资金往来，禁止朝鲜从中国或通过中国运送导弹和核相关技术。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安全部主动邀请美国中情局检查运往朝鲜的装有浓缩铀离心机或导弹部件的集装箱，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吧。然而相反，在执行联合国制裁方面进行的合作大多勉强而敷衍。中国更积极全面地执行安理会制裁文件的文字和精神，不仅可以打击朝鲜核计划，还可整固必要的防护网，阻止朝鲜输出核技术或材料（朝鲜人 2003 年在北京警告美方代表团，声称他们正准备这么做。4 年后在叙利亚埃尔·凯巴尔反应堆果然抓到他们的把柄）。

北京还可通过同意重构朝鲜半岛周边更大的外交框架，表明自己与其他大国同道相益。布什政府 2003 年初提出“六方会谈”，目的是利用东北亚其他大国的影响力敦促平壤取消核计划。回想克林顿政府时期，

那么，美中之间真正的战略合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模式是欧洲主要大国的“联络小组”在会谈中协调施压政策，对塞尔维亚顽固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一个声音说话。这很见效。而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希望由中国来主持对话（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躲避这一问题）。但这个错误让北京以为六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和地位。结果，朝鲜对于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对话有说“不”的权利，而北京又拒绝在没有平壤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另外五国会议。因为朝鲜缺席2003年的一次碰面，五国仅举行过一次被傅莹大使称为“可以聆听”的会谈，商讨首轮六方会谈的联合声明。我代表美国参加了这次会谈，并感慨我们的讨论是多么富有成效。自那以后，中国就拒绝召集或参加没有朝鲜的五方会谈。甚至俄罗斯外交官也承认，目前举行五方会谈非常有必要。所以，北京最好重新考虑它坚持不在地区外交中孤立朝鲜的立场。北京不妥协的核心，在于担心被朝鲜问题反噬，以及日韩两国坐大（两国均不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但这些心思只说明中国没有在朝鲜问题上真正给予合作。

许多评论家争辩说，中国与美国战略合作最重要的证明，就是它帮助推翻金氏政权（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曾把这个随手可用的建议写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称为“雪花”的备忘录。奥巴马和特朗普内阁在不同问题上也抓住这个“灵丹妙药”不放）。“中美聚焦”的读

者们无需提醒就应该知道这在北京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它有战争危险，会使中国东北陷入混乱，会导致出现一个民主统一的（很可能）与美国结盟的韩国。北京也许能够推翻朝鲜政权，后者约90%的粮食、出口和燃料依靠中国，但中国没有这种意图或意志力。朝鲜核计划的目的是阻止美国的进攻，以及给金家政权歌功颂德，同样它也是为了确保中国的这种状态能够延续下去。

既然结束朝鲜核计划和人民的痛苦比结束金氏政权更难把握，因此，并没有哪届美国政府主动尝试推翻平壤的领导人。我们该怎么应对失控的核武器和难民？在半岛全面开战会不会让数百万人丧生？针对这些可能性制定规划尤为重要，因为朝鲜的对外好战与其政权内部的倾轧加剧相当同步。金正恩暴力处决家庭成员和近百位高级将领，证明该国政局难以长治久安。我参加过各种与中国专家的官方和学界对话，讨论一旦朝鲜突发动荡或崩溃美中双方应如何合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由于中方的敏感，非官方讨论更富有成果。不过15年来，我在此类对话中越来越感到，中美两国对朝鲜的动荡或崩溃有共同合作的基础。但如果没有更多技术上的、现成的交流，朝鲜巨变带来的冲击就可能互不信任和敌意，让美中在整个地区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的根本分歧暴露殆尽。

这也再次提醒人们，为什么朝鲜的未来对东北亚的未来秩序至关重要

要，以及为什么当前的核危机会让北京如芒刺在背。朝鲜战争因停战而冻结，其长期遗产是中国的孤立和东亚建立起了由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近半个世纪前，中国和世界领导人选择结束前者，而中国战略思维的基础是假设后者（美国的同盟体系）会随时间流逝而消亡。朝鲜核威胁破坏了这一假设，因为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做的事情有可能转变成为持久的地区性集体安全安排，其核心是导弹防御、核威慑和联合的军事力量。朝鲜的威胁固然是诱因，但人人都知道中国意图不明也是一个因素。事实上，美国及盟国的领导人已经发现，随着朝鲜事态升级，他们加强防务合作不仅是出于自卫需要，还可以动摇北京自以为是的假设，即朝鲜半岛问题各方只要降低调门，一切就会好起来。

到目前为止，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互动特点是只有零散的战术合作，而在战略上互不信任。随着朝鲜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天平可能会向任何一方倾斜。想清楚我们希望从北京得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然后通过调整我们的同盟和施压手段、外交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是确保美中为应对最后的共同威胁而进行真正战略合作的最好方式。◎

北京不妥协的核心，在于担心被朝鲜问题反噬，以及日韩两国坐大。



寻求共同安全， 而不是绝对安全

为实行承认国家间相互关系与相互依赖的共同安全政策，华盛顿在核武器问题上必须后退一步，并对“按我说的做，别按我做的做”这一对外政策守则的道德与实践意义进行重新评估。

任何有效的安全范式都必须解决所有成员合理的安全关切与利益。鉴于分裂的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地区敏感的冲突点和战略枢纽，共同安全对其具有特殊意义和紧迫性。在这种环境下，与其他地方一样，我们的大前提都必须是从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没有谁比亨利·基辛格更加现实地指出追求绝对安全的根本缺陷：“一个大国对绝对安全的渴望，就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

更有启发性的是，今年1月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作主旨发言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唤一个无核

的世界：“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全面禁止并最终彻底销毁，实现无核世界。”他还呼吁各国“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并承认“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相比之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却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张自己的核力量，直到全世界对核武器有清醒的认识”。

由于美国的认知一直受“911”二元论精神的影响（黑利大使在安理会的口头禅就是：国家要么与我们为伍，要么与我们为敌），因此安全危机有升级危险，甚至有可能把朝



金淳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鲜进一步推上不可逆转的核武之路。追求绝对安全，肯定会酿成核扩散。

共同安全则打破安全困局的恶性循环，遏制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发展态势。为实行承认国家间相互关系与相互依赖的共同安全政策，华盛顿在核武器问题上必须后退一步，并对“按我说的做，别按我做的做”这一对外政策守则的道德与实践意义进行重新评估。

过去两年里，尤其是4月中旬以来，曾出现过若干次有希望但没有得到重视的迈向共同安全的迹象。首先，创建并统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劳动党在中断36年后于2016年5月6日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金正恩不出意料地再次被确认为党的领袖和国家统治者，但大会却从“第一次打击”理论后撤一大步，宣布“只要侵略性敌对势力不用核武器侵犯朝鲜的独立，朝鲜就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声明不仅为朝鲜本国有核力量的法律添加了权威性解释，更重要的是它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不率先使用”的原则，表明其率先实施核打击的立场出现了逆转。紧接这一举动，7月份朝鲜又提出了一份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更具体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声明是由朝鲜政府发言人宣布的，这是2013年以来的首次，声明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训”。

其次，经过十多年的保守执政，韩国如今有了一位进步总统文在寅，他似乎决心恢复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的“阳光政策”。

第三，中国一再呼吁回到“通

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鉴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是最充满希望的迹象。中国对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2016年9月9日）表示反对，呼吁早日恢复“六方会谈”，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第四，随着美朝核对抗升温，来自包括南北朝鲜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女性和平活动家敦促特朗普总统缓和军事紧张态势，展开和平谈判，避免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我们一致认为，外交是解决核危机及朝鲜半岛此刻面临的战争威胁的唯一途径”，她们在4月份给特朗普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朝鲜社会主义妇女联盟也在这封信上署了名，女性和平活动者组织“女性穿越非军事区”（Women Cross DMZ）的国际协调员克里斯汀·安认为这很重要，“因为与朝鲜其他组织一样，它是不会忤逆平壤中央政府的意愿而独自行事的”。

第五，出于对他们所说的特朗普总统古怪行为的担心，64位民主党议员今年5月份敦促特朗普与朝鲜人直接对话，并警告他若想实施任何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都必须经由国会批准。“没有哪些决定比向朝鲜这样的核武装国家发动攻击或宣战更需要进行辩论了，”国会议员们在联名信中写道。这封信的牵头人是国会中最后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民主党人、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

为重启“六方会谈”，北京要做的不仅仅是敷衍了事地发出外交呼吁。首先，它必须恢复积极的中介/穿梭外交，以获得平壤的同意。萨

“一个大国对绝对安全的渴望，就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

—— 基辛格



达姆·侯赛因和穆阿迈尔·卡扎菲停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后的命运，让平壤汲取了教训，它知道不断被重复的咒语“先无核，再谈判”只会毁掉交易，而不是促成交易。要通过签署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来抚慰朝鲜的不安全感，同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允许它成为重要多边经济机构的成员，向它提供人道主义食品援助。这些虽然成本并不高，但在谈判进程中建立信任与信心，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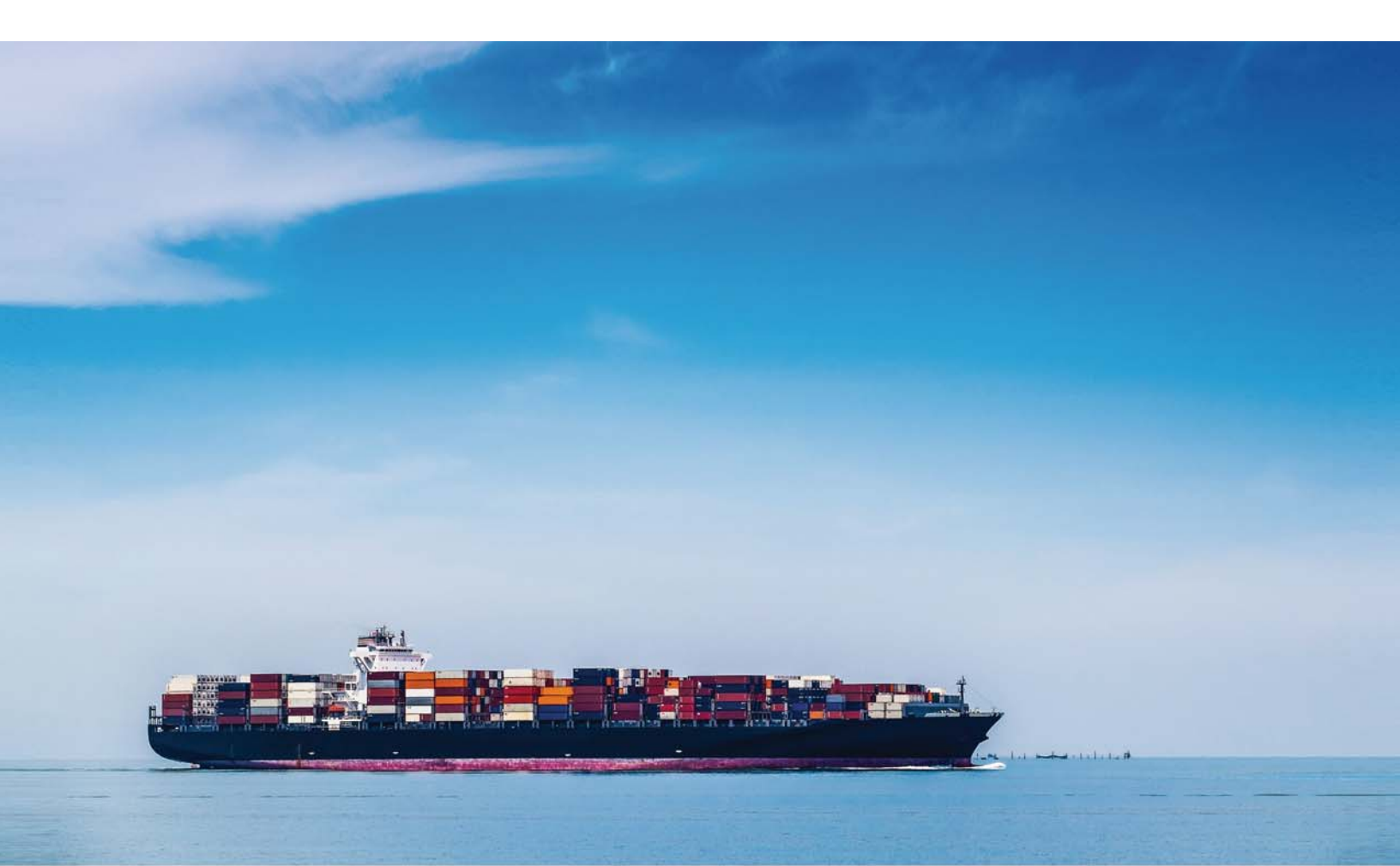
要想废弃核武器，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朝鲜要首先选择核武器。经过美朝之间 23 年断断续续的对抗与谈判，现在已经很明显，平壤不会

放弃核与导弹计划，除非有足够证据表明美国结束它对朝鲜的敌意及惩罚性的制裁战略。只有采取措施，重拾共同安全理念——主要是签订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和平条约或互不侵略条约，美朝关系及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才会立足于更加稳定、安全和理性的基础之上。

本文改编自金淳基的《围绕核朝鲜的美中竞争》（见《Insight Turkey》第 19 卷第三期，2017 年夏）◎

共同安全则打破安全困局的恶性循环，遏制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发展态势。

经过美朝之间 23 年断断续续的对抗与谈判，现在已经很明显，平壤不会放弃核与导弹计划，除非有足够证据表明美国结束它对朝鲜的敌意及惩罚性的制裁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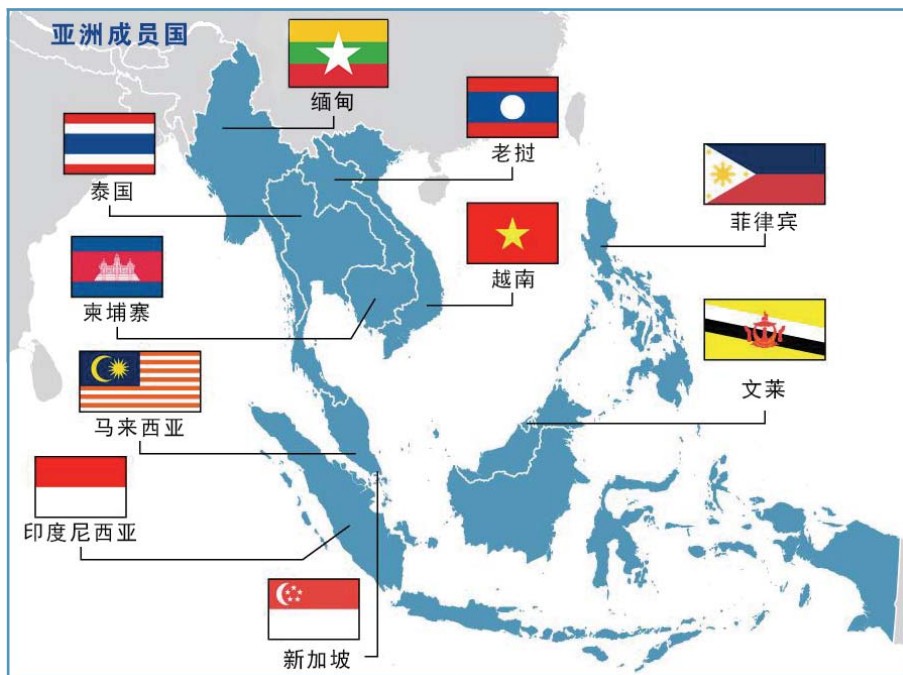
**Dive below the
surface, go back in
history.**

Click: chinausfocus.com/south-china-sea/



重要的“一小步”

框架协议签署虽然只是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向前迈出一小步，但实际上对中国与东盟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朱 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8月5日，第50届东盟国家外长会议批准了中国-东盟“南海行为准则（COC）框架协议”。这是管控争议、降低紧张局势、防止南海问题破坏中国-东盟关系取得的重大进展，展示了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与一致。

框架协议的签署虽然只是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向前迈出一小步，但实际上对中国与东盟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自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发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以来，15年过去了。这期间，两个因素一直在妨碍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意见。其一是在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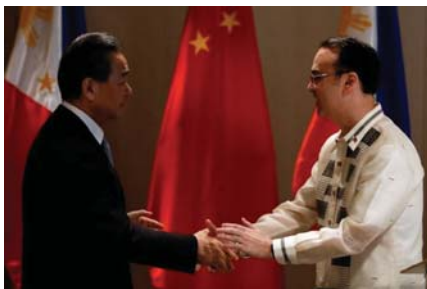
南海行为准则究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二是谈判南海行为准则，双方需要避免什么样的争议因素？重要的是不能混淆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和解决主权争议的谈判。南海行为准则应该为谈判解决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创造条件，而不能直接干涉或者阻碍谈判进程。

另外，如果南海行为准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那么这一文件的谈判从一开始就不能成为域外力量干涉南海问题的工具。任何谈判都应该是中国和东盟之间为推进地区稳定与合作，自主、自觉、自愿采取对话的结果。进一步来说，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保证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精神是根本性的，有意愿降低域

在域外大国的干预与支持下，东盟中的南海声索国加大了主权争夺。



■ 8月7日，第18届东盟+3外长会，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和中国外长王毅（中）与其他国家外长手牵手。



■ 7月25日，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右）与中国外长王毅握手。王毅表示支持在有争议的南海建立中菲能源合资企业的设想。一天前杜特尔特总统表示已找到开发油田的合作伙伴，开采活动将在今年重启。

外势力的干扰才有助于维持南海的和平。

自2002年以来，南海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和东盟中的南海声索国都加大了对南海权益主张的投入。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进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战略局势，成为中国在南海维权与维稳的重要依托。

在域外大国的干预与支持下，东盟中的南海声索国加大了主权争夺。菲律宾让南海争议第一次走进国际仲裁，破坏了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达成的南海相关争议

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谈判协商解决的共识。仲裁庭宣布对菲律宾所提仲裁案拥有管辖权，本身就违背了只有双方穷尽外交手段才应诉诸第三方解决的国际法原则。

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其实已经概括和反映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发表15年以来南海争议的新形势，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和东盟决心管控分歧、缓和紧张局势、规范各国行为、深化战略合作的强烈意愿与务实精神。框架文件虽然言简意赅，但立意清晰，不是简单地着眼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的行为，更着眼于未来南海的危机管控和共同行动机制。

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不断向前推进。今年晚些时候，中国与东盟有望启动达成有约束力南海行为准则协议的正式谈判。中国和东盟需要将这份框架文件规范化，为世界展示即便有主权争议的国家仍能通过自律与务实合作及建立区域机制，管控南海争议与紧张态势。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说，“历史将会证明，谁是南海真正的主人”。

“历史将会证明，谁是南海真正的主人”。

南海行为准则应该为谈判解决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创造条件，而不能直接干涉或者阻碍谈判进程。

人工智能 - 新的合作前沿

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人工智能领域两个最强的参与者，必须携手合作管理这项新的技术。



■ 2017年5月23日至27日，谷歌AlphaGo人工智能程序在3盘比赛中连赢世界头号围棋选手柯杰。

7月20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任务。中国政府认为，人工智能对中国成为科技与创新强国和网络强国十分重要。近年来，各国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纷纷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把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战略制高点。

各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源于该技术拥有无可比拟的变革潜力。首先，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高劳动生产力，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该技术将带来以信息为基础的新一轮生

产力革命。它将把人们从低效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传统的生产关系将因此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将释放出巨大的技术红利，迈入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其次，人工智能有可能重塑现有的社会体系框架，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规模使用需要改变现有的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和道德观念，更新城市规划者和治理者的理念。最后，人工智能将催生军事变革。军事机器人将大幅降低战争成本、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力差距，也会重新定义未来战争的形态。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存在着诸多



李 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牛 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2017年4月24日，中国安徽合肥，身穿传统服装、具有中国美女真人外形的新一代互动机器人佳佳通过网络与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人兼执行编辑凯文·凯利对话。佳佳能讲话、做微表情、活动嘴唇和身体。

风险。首先一个风险就是数据伪造，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短时间内可以生成大量伪造的图像、文件、音频和视频，这些伪造的信息难辨真假，经由互联网传播后可造成灾难性后果。第二个是法律和道德风险，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对人工智能作相关规定，人工智能技术并非绝对客观中立，其相关程序参数是人为设置的，反应了设计者的主观想法。目前对自动化武器是否有能力作出主观判断仍存在较大争议，此类武器与《日内瓦公约》等现存国际战争法和规则体系存在冲突。第三个风险涉及就业和贫困问题，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可能造成持续性失业，扩大赤贫群体，继而引发社会动荡。富人将更有条件获得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新科技带来的益处，这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第四个风险是军备竞赛，目前军用机器人的规模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无人机成为全球军售市场的主要增长点，这可能引发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军事竞赛。

在全球，中美两国是人工智能

领域最强大的参与者。两国长于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涉及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美国科技巨头IBM、谷歌、微软、Facebook等在技术上领先全球，而中国企业则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领域有较强技术能力。两国都有数量巨大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数据分析公司CB Insights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业中，美国占59家，中国占27家。

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决定着合作至关重要，但竞争也不可避免。当前，两国的合作远大于竞争。美国企业关注点通常集中于基础技术，而中国企业则更关注应用技术，形成了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合作模式。与此同时，两国也存在对彼此的担忧和误解。其一，美国担心失去绝对优势。有美国媒体担忧随着中国加大政策支持和美国削减研发经费，美国难以保持绝对优势地位。其二，两国在军事领域发生恶性竞争。《纽约时报》报道称，中

人工智能技术并非绝对客观中立，其相关程序参数是人为设置的，反应了设计者的主观想法。

美国企业关注点通常集中于基础技术，而中国企业则更关注应用技术，形成了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合作模式。

国正快速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其三，美国担心人才和技术流失。中国的百度、腾讯等科技公司纷纷加强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引进一流人才并在美国设立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些担忧已经逐渐演变为战略猜忌，一些美国专家建议对中国对美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阻止中国企业并购、投资美国相关企业。一些人甚至建议应阻止中国学者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降低中国技术和专利的国际知名度。中国也担忧美国会将互联网霸权延伸到人工智能领域，对美国企业采集中国社会数据更加谨慎。

如果这种误解和猜疑不断加深，人工智能就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个麻烦而不是机遇，这不仅不符合两国利益，也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的示范效应。两国应采取一些措施改变这一趋势。

结合中美网络安全领域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建议两国政府应共同促成

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重要的是要早在技术发展期就养成合作习惯，携手消除疑虑，管控分歧。两国也许达成协议，开放市场，减少投资中的政治阻碍。私营部门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力军，但是政府的作用在于向资金不足的基础研究以及私营部门不感兴趣的长期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政府同时也应吸纳其他国家的新技术。

中美两国政府必须管控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威胁。双方应意识到人工智能武器化将带来军事竞赛和武器扩散风险，要降低此类武器流失到恐怖组织和挑衅性国家的可能性。两国应着手为人工智能武器化设定限制、规则和国际合作机制，引领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最后，两国政府必须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规则的建设。两国应共同减少该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冲击，阻止人工智能产生“技术鸿沟”，帮助欠发达国家和贫困民众适应和应用这项技术。◎

人工智能就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个麻烦而不是机遇。



■ 2017年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兴奋的年轻人观看机器人表演。

CHINA & US Focus

Engage, Stimulate and Impact



Go Bilingual

We have expanded footprint and reach by making Focus contents available in Chinese.



WeChat

ID:Chinausfocus



Go Mobile

Wherever you go and whenever you want, China-US Focus is just a tap away on your mobile or tabl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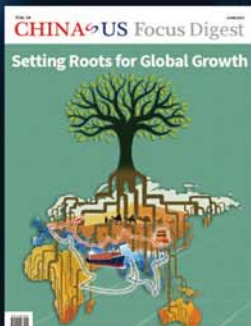
Facebook



Chinausfocus



Further Insights



The bi-monthly magazine's readers range from policy-makers to diplomats, from scholars to opinion leaders from both countries.

We are available at chinausfocus.com